

学术新视野

XUSHU XINSHIYE

跨文化的中国叙事

——以赛珍珠、林语堂、汤亭亭为中心的讨论

KUA WENHUA DE ZHONGGUO XUSHI

高 鸿 著

上海三联书店

跨文化的中国叙事

——以赛珍珠、林语堂、汤亭亭为中心的讨论

KUA WENHUA DE ZHONGGUO XUSHI

高 鸿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跨文化的中国叙事/高鸿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6
(学术新视野)
ISBN 7-5426-2128-9

I. 跨... II. 高... III. 小说-文学研究-中国-
现代 IV. I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63448 号

跨文化的中国叙事

——以赛珍珠、林语堂、汤亭亭为中心的讨论

著 者 / 高 鸿

责任编辑 / 刘宏伟

装帧设计 / 范峤青

责任制作 / 沈 鹰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 / 上海师范大学印刷厂

版 次 /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75 1/16

字 数 / 190 千字

印 张 / 13.5

印 数 / 1—4000

ISBN 7-5426-2128-9

C·104 定价:26.00 元

总 序

钱谷融

今天一觉醒来,听到窗外鸟声悦耳,一定又是个好天气,心情非常舒畅。我住在华东师范大学二村,这是一个只有二百来户人家的院落,环境幽静,绿树成荫,虽近闹市,却隔离尘嚣,是一个居家的好所在。我又在五年前就已退休,没有什么非办不可的事务缠身,常以一杯茶,一本书打发光阴。真是悠哉游哉,十分逍遥自在。

忽然电话铃声响了,是郑家建君打来的。家建是我过去的博士生,毕业多年,现在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担任领导工作,有事来上海,正住在附近的一家宾馆里,说马上过来看我。不一会他就到了,原来他是为他们学校的事来的。近年来福建师范大学中文学科在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下,非常重视学术理论的研讨和学术梯队的建设工作,成效显著,为各兄弟院校所共知。这次家建来,就是为他们“学术新视野丛书”的出版而来求我写序的。我虽深感荣幸,但学术荒疏,且又老迈,作者们所探讨的问题,又都是我从未涉足过的领域,我何敢赞一辞?不过却之不恭,又因福建师大文科这几年来在科研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而不禁深为国家的学术繁荣、新人辈出而欢欣雀跃。就随便写几句吧。

这一辑“学术新视野丛书”共十四种,其中有好几种涉及传播学的问题。传播学近来日益受到人们的注意,它的发展前途日新月异,无限广阔。其他如《周易禅解》、《〈祖堂集〉动态助词研究》、《道教神仙戏曲研究》等都是过去少有人涉足的领域,显示出人们的研究兴趣的拓展,学术视野在不断地扩大。这是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另外,我统计了一下,十四位作者全都是上一世纪60年代以后生的人,其中半数以上还是70年代以后才出生的,真是江山代有才人出,而且正如长江之后浪推前浪,往往是一浪高过一浪。这样生生不息,连绵无穷,发展无有尽期,前途未可限量。这是值得注意的又一个方面。



学术研究不但要善于继承和发扬前人已有的成果,尤其贵在创新。要不断开辟新途径,拓展新领域,使我们的眼前能出现一片新的天地;使我们常能站在新的高峰,展望新的美好的未来。这一辑“学术新视野丛书”所起的正是这样的作用。我在此对众位作者们敬致衷心的感谢。同时也希望各位作者能继续关注自己的作品,注意听取读者的意见,吸收新的营养,精益求精,使内容不断臻于完善。

写到这里,该说的和想说的似乎都已说完了,也可以勉强交差了。而窗外阳光灿烂,麻雀在树枝间跳来跳去,非常活泼,我的心情也和它们一样的欢快。

2005年5月16日

序

刘登翰

文化的“流通”，以及其在跨文化的“流通”过程中，由于传播者身份的不同、语境的不同，以及“传播”这一文化行为的目的的不同，同一文化常常会呈现出或衰减、或叠加、或融合、或变异的不同形貌。文化“流通”中的这种现象，一直是个饶有兴味的问题，受到人们的关注。世界华文文学研究面对的是不同国家/民族、历史/文化语境中的华文创作现象，理所当然地潜在着文化“流通”中的这一系列问题。只不过我们最初的研究，较多地集中在第一、二代移民作家身上，并着重于其对中华文化在异文化语境中如何守成与弘扬的主题上，对文化“流通”中的种种异变现象，并不十分突出地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只有当以汤亭亭为代表的一批美国华裔作家阐述祖根文化的英文写作进入美国主流文坛，我们才意识到这一现象的深刻与重要，并由此逐步改变了我们以往以“语种”为界定的华文文学研究，扩展为带有“族性”意味的华人文学研究。概念的变化不仅拓宽了我们的研究领域，深化了我们研究内涵，而且在方法上也促使我们更多地去借鉴人类学、文化学、比较文学等手段，提出新的研究命题与范式。

因此，几年前当原先从事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的高鸿决定报读我的博士研究生时，我曾经颇为犹豫。主要是担心我对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的陌生，不足以给她称职的指导。然而转念一想，广义地说，海外华文文学（或华人文学）也是一种外国文学。如果能在高鸿原有的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的学识背景上，找到其与华文文学（或华人文学）的某个连接点，不是也能够发挥她固有的学术优势，并为华文文学（或华人文学）研究拓展一个新的学术空间，或引进某种新的研究手段和范式吗？

事实也正是如此。



我们面对的这部著作,是高鸿最终完成的博士论文。它正是在世界文学与华人文学的连接点上呈现出作者的创意新意。具体而言,193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赛珍珠,20世纪70年代以后进入美国主流文坛的华裔美国人汤亭亭,都是美国文学值得书写的一章;而30年代定居美国并以多部英文小说和文化著述向西方介绍中国的林语堂,则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他和汤亭亭还因为完全或不完全的中国血统而被视为海外华人作家。他们有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身份、立场和著述动机,却以共同的直接或间接的中国经验作为他们中国叙事的基础,从而形成他们彼此之间的趋同性和差异性。分开来看,赛珍珠研究,林语堂研究,乃至近年才引起广泛讨论的汤亭亭研究,都不是什么新鲜的论题。然而当把他们连结在一起,以共同的“中国叙事”为中心进行文化分析和比较,他们之间的差异性就使论题本身潜在的学术空间充满了可供深入探讨的诱惑力和挑战性,这也是这部著作能够展现新意的所在。在博士论文的写作中,我深深感到,论题的选择具有十分重要甚至是关键的意义。论题的发现是一种学术的发现,而发现是所有创新性劳动的前提和基础。不能不说这部著作所以具有一定学术价值,首先是因为作者从差异性的比较中发现了论题的新意。

当然仅有这一点还是不够的。如何将这一朦胧感受到的新意形成一种深入分析的学术架构,是对作者更重要的学术检验。我们注意到作者在自己固有的比较文学的知识背景上,广泛应用了形象学理论、文化身份理论以及后殖民、后现代和文化人类学等学说与方法,深入解剖自己的研究对象。所谓“文化主体性与异国形象”,所谓“文化身份与东方主义”,所谓“叙述策略与文化利用”,三个身份迥异的作家跨文化的中国叙事,在这一理论框架下获得了深入细致的剖析,凸现了他们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艺术个性与呈现。而抽象的理论由于进入了具体的分析对象,而呈现出生动活泼的生命。应当说,作者在理论与对象的联系上,做了相当有成效的努力。她在前人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对于自己分析对象十分有益的概念,从而使作品的分析显得深入而且得体。分散的、个别的、本来并无必然联系的三位不同时代和身份的作家,在作者的论述中,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结构。在应用西方理论剖析东方形象上,作者这些可取的做法值得我们关注。



严格说来,任何一个具有深刻学术内涵的研究对象,都是一个永远诉说不尽的话题。何况本书所面对的三位作家,都堪进入经典。在比较之中寻找他们的价值和差异,是一种研究的组合方式。换一个研究者必然会有另一种组合方式和话语方式。经典的价值和意义应当是无可穷尽的。因此只能说本书的研究只是这一过程中的某一阶段或某一侧面,尚有许多新的空间有待进一步去深入和拓展。

博士论文的出版只是一位研究者学术生涯某一阶段的标志。对于相处三年的本书作者,我以这篇短文寄予深深的期待和良好的祝愿。

二〇〇五年三月



目 录

总 序 / 钱谷融	1
序 / 刘登翰	1
导 言 /	1
 第一部分 文化主体性与异国形象	21
第一章 “自我”与“他者”相互观照下的中国 ——赛珍珠笔下的异国形象 / 22	
一、古老的与现代的“土地” / 24	
二、现实的与想象的差异 / 30	
三、相异的与相同的风俗人情 / 34	
四、看见的与看不见的“社会集体想象物” / 39	
第二章 “自我”主体性的此长彼消 ——林语堂英文小说中的自塑形象 / 45	
一、以道家精神和儒家伦理构筑中国人的生活 / 48	
二、以“抗战”打造中国民族精神 / 53	
三、以传奇追溯中国古代文化 / 57	
四、远离中国、幻想文化的大同世界 / 61	
第三章 “自我”主体性的混杂与迷思 ——汤亭亭笔下漂移的中国形象 / 71	
一、“故事”及缝隙里的中国文化 / 73	
二、历史记忆深处的变形与置换 / 78	



三、“说故事”背后的文化意图 / 84

第二部分 文化身份与“东方主义”

95

第四章 西方文化精神与“东方主义”

——赛珍珠文化的体认与殖民体系立场 / 97

一、历史中的追寻 / 97

二、“母亲”和“父亲”形象 / 99

三、殖民体系下的“东方主义” / 103

第五章 中国文化精神与“自我东方主义”

——林语堂对中国文化的自然体认 / 105

一、双重世界里对中国文化的自然体认 / 105

二、无法逃脱的“自我东方主义” / 109

第六章 后殖民语境与“东方主义”

——汤亭亭在怀疑和疏离中的文化认同 / 120

一、对中国文化价值的怀疑 / 120

二、“边缘人”形象的危机隐喻 / 123

三、“精神世界”的回望 / 124

四、后殖民语境下的“东方主义” / 126

五、两种文化身份的特定表现 / 127

第三部分 跨语境叙事策略和文化利用

131

第七章 中国小说与“母题”之变奏 / 132

一、《中国小说》 / 132

二、“中国最佳小说体裁”与“中国故事” / 133

三、“花木兰”形象之变奏 / 135

第八章 文化人类学视域下的日常生活描写 / 139

一、《京华烟云》的“日常生活”描写 / 139

二、日常生活描写的文化人类学意义 / 142





第九章 历史去魅的“自内解殖” / 144

一、“自内殖民”存在与形态 / 144

二、“越界”与“迁移”的文化策略 / 146

第十章 西方语境下的中国文化利用 / 148

一、几个世纪以来西方的中国形象 / 148

二、不同身份文化利用的不同性 / 152

结 语 跨文化中国叙事与“异”的文化幻象 / 155

附 录

158

想象与记忆的共同体

——旅美作家群笔下的中国想象 / 158

林语堂英文小说《京华烟云》的文化叙事 / 168

马华诗人的“生命树”

——吴岸作品的本土意识与文化认同关系 / 180

比较文学对华文文学研究的启示与作用 / 191

主要参考书目 / 199

后 记 / 203



导 言

文学作为文化的表征系统，是文化意义的生产和交换的实践者。而在不同文化之间的意义理解和交流中，文学以自己特有的形象创造，实践着不同文化的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交流、传递的作用，并且也因自己的独特文化意义，组成了世界文化的多元、差异和丰富。所以“文学”既是一种文化意义的表达形式——表征，又是能够承担传递和理解作用的不可或缺的“文化角色”。

在 20 世纪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文学是实践不同文化间相互传递与交流的重要手段，文学以自己的审美形式显示了异质文化语境下人们对于不同文化的理解和阐释。而长篇叙事作品更以其特定的描情状物的叙事功能，沟通和传递着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和相互认识，或者表现出相互冲突的文化事实。美国学者史景迁(J. Spence)在他的《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世界文化总体对话中的中国形象》一书中，就西方世界在 20 世纪对中国的“言说”，勾勒出一条西方作家描绘中国的历史线索：卡夫卡的《万里长城建造时》(1917)、西格伦的《雷内·雷》(1922)、马尔罗的《人的命运》(1933)、卡内蒂的《迷惘》(1935)、布莱希特的《四川好人》(1940)、博尔赫斯的《交叉小径的花园》(1941)、卡尔维诺的《隐形的城市》(1972)以及“研究和利用中国”的大诗人艾兹拉·庞德的诗作。史景迁在该书结尾总结说：

我所谈到的大多数作家都是在他们感到自己所处的文化前途未卜的时候开始研究中国的。对于那些深怀不安感和焦



虑感的西方人来说,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他们的一条出路或退路。^①

虽然许多西方人对中国发生兴趣,写下了一批中国故事和理论,但是“中国依然没有完全融入西方的思想意识之中。实际上我们离这个目标还差的很远”。“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是作为一个‘他者’出现的”,中国有用之处正在于此。^② 由此我们看到,史景迁所描述的这一批中国题材的重要作品,只是西方作家对“中国”这一“他者”的文化利用,他们把“中国叙事”看成是“自我”言说的重要出路,他们希望在“中国”这个“他者”身上,找到“自我”的需要。中国学者乐黛云则从学术研究者的立场和身份出发,认为在形象学研究领域——

欧洲学者谈“异乡”、“异地”、“异国情调”,北美学者谈“他者”,其实都是为了寻找一个外在于自己的视角,以便更好地审视和更深刻地了解自己。但要真正“外在于自己”却并不容易。

人,几乎不可能完全脱离自身的处境和文化框架,关于“异域”和“他者”的研究也往往决定于研究者自身及其所在国的处境和条件。^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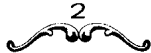
可以看出西方学者和中国学者都认为在跨文化的中国叙事里,作家身份和立场的重要性,他们所创造的“异国形象”,或者说中国形象,与创作者的身份存在着某种联系。

换句话说,在跨文化的叙事作品里,叙述主体与叙述客体之间有着不同的关系,同样是跨文化的中国叙事,有些是外国作家对异国的描述,比如赛珍珠的中国题材作品《大地》三部曲,就是这一类型的代表作。而有些是中国作家面对异国读者用英文创作的中国题材作品,旅

① [美]史景迁讲演,廖世奇、彭小樵译:《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186页。

② [美]史景迁讲演,廖世奇、彭小樵译:《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187页。

③ 乐黛云:《中国比较文学发展透视》,《东方丛刊》1998年2期(转引自 www.gxnu.edu.cn)。





美的现代作家林语堂的许多英文作品属于这一类型。在美国,林语堂创作了七部英文长篇,最为著名的有《京华烟云》(Moment in Peking)、《风声鹤唳》(A Leaf in the Storm)、《唐人街》(Chinatown Family)和《朱门》(Vermilion Gate),以及《奇岛》(The Unexpected Island)。他还翻译和改写了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结集为《中国传奇小说》。比较文学学者孟华把这类作品所塑造的中国形象称作“自塑形象”。^① 另外,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华裔美国文学异军突起,那些自幼迁居美国,或在美国土生土长的新一代的华裔作家,他们不断地用英文写作描绘了他们所认识、理解和想象的中国。他们生活在唐人街——中国文化“飞地”上,聆听父辈的“中国故事”,阅读中国文学与文化,间接得到了关于中国的印象。他们对于中国的叙事,表现出了不同于林语堂那一代华人作家的特点。华裔美国作家汤亭亭的《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中国佬》(China Men),谭恩美的《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和《正骨师的女儿》(The Bonesetter's Daughter)等作品,是这一群体作品的代表作品。

所以,这些关于“中国”的不同叙事创造出了很不相同的中国形象,那么哪一个“中国形象”是更真实的呢,哪一个“中国形象”又完全是创作者的虚构和想象呢?在他们所创造的这些“中国形象”中,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异国形象”的巨大差异呢?是由于他们不同的文化背景,还是不同的文化身份?;是由于他们个体对异国理解不同,还是社会大众对异国的不同认识在他们作品上的反映?;是由于他们对叙事对象采取不同的叙事策略,还是他们对自己的创作有着不同的目的与需要?;或者说,这些问题本身就是一连串互为相关的问题,是这些互为相关的

① “自塑形象”是孟华教授提出的一个概念,它“指称那些由中国作家自己塑造出的中国人形象,但承载着这些形象的作品必须符合下述条件之一:它们或以异国读者为受众,或以处于异域中的中国人为描写对象,但都具有超越国界、文化的意义,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被视作一种异国形象,至少也可被视作具有某种‘异国因素’的形象,理应纳入形象学研究的范畴中来”。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论文翻译、研究札记》,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版,第15页。本书将林语堂英文小说中所描绘的“中国形象”认同于这种具有异国因素的“自塑形象”。





问题导致“形象”创造的差异性。本书认为,叙事作品的“异国形象”创造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创作者的主体意识/主体性会对异国形象产生作用,换句话说,透过他们笔下的异国形象,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创作主体的位置与变化,可以从作品的描叙中,体味出他们不同的文化身份,以及这些不同身份在处理东西方文化关系时所显示出的“东方主义”的不同形态,同时还能够把握创作者用以完成他们的目的所采取的不同的叙事手段和策略。

因而,在跨文化的异国形象创造中,创作主体的文化身份必然作用于作品,这是使异国形象产生区别的最为重要的因素。反过来,异质文化语境下创作的文学作品,潜在地表现和传达了文化身份和族裔政治等问题,因为文学作品不仅仅是想象与虚构的产物,同时它也是社会的反映,是不同文化权力关系与政治差异的折射。长篇小说从叙事角度构筑了不同文化的历史空间,我们可以在这样的空间里,看到种族/族群、阶级、性别、国家/民族等文化认同等问题;在这样的空间里,我们可以看到“自我”文化与“他者”文化的相互关系与相互作用;在这样的空间里,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和矛盾,看到不同文化间的权力关系。赛珍珠、林语堂以及汤亭亭的作品正是以或隐或显的形态,表现出异质文化间的这些问题,从而获得我们的关注。

因此,本书选取美国人赛珍珠、旅居美国的中国人林语堂和华裔美国人汤亭亭的跨文化的中国叙事文本,作为研究对象,以期从这些不同文本的相同“主题”分析中,探讨文化主体性与异国形象创造之间的关系,探讨文化身份和东方主义不同形态之间的关系以及具体创作中的叙事策略问题,并从这三者关系的分析中,进一步检视跨文化创作中所存在的“真实与想象”、“历史与虚构”和“双单向道”等问题。

二

对“文化”概念的理解和运用

英国文化研究者雷蒙·威廉斯在《文化分析》中说,文化一般有三种定义——“理想的”、“文献式”以及文化的“社会”定义,我们从中看到,这三种文化定义实际上是三个层面涵义的表现,是三种价值判断。





本书认为威廉斯的“文化”定义,不是“文化”的三种可以分离的表现方式,而是文化的三个层面的涵义。他通过对文化的三个层面的价值判断,将文化的定义扩展到传统上旨在表述精英文化为“文化”的定义之外。^① 根据“理想的”文化定义,“文化分析在本质上就是对生活或作品中被认为构成一种永恒秩序或与普遍的人类状况有永久关联的价值的发现和描写”。这个分析显示出“文化”表现人类绝对和普遍的共通思想意识的价值。“文献式”对文化的定义是“文化是知性和想象作品的整体,这些作品以不同的方式记录了人类思想的经验”。第二个层面强调表现人类思想经验的知性和想象作品在表现方式上的独特性,是艺术和学问的价值判断。而文化的“社会”定义,则表明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这种描述不仅表现第二层面的判断,还表现“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某些意义和价值”,是制度和日常行为意义的价值判断。这一层面的理解也被认为是“人类学意义”上的定义。而文学作为“文化”的一种“版本”形式,以往人们更多看到的是第一、第二个层面的涵义,对第三个层面的涵义的“发现”正是雷蒙·威廉斯文化定义的新意所在。他在这里强调了日常生活描写的意义,换句简单的话说,“文化”不仅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的,而且还是“日常生活性的”。因此文化是这样一种东西,是思想意识、艺术表现和日常生活的一种混合物。因而,从文化的角度来评判文学作品的,自有其不同于文学审美的评判标准。对于不同文化语境下创作的作品,其评判的价值和标准就有所不同。因此,那些跨文化文学文本里的“异国情调”描写和“日常生活”描写,就容易引起异质文化语境下异文化读者的注意。更进一步说,对于不同文化读者来说,那些跨文化创作的叙事作品具有不同的阅读价值和意义。因此文学作为文化的一种手段,或者一种“交流”的“语言”,或者一种“表征系统”,在不同文化的传递上是有自己十分独特的贡献的。但是跨文化创作的作品,不仅表现出对异文化读者“期待视野”融合的要求,也呈现跨文化叙事作者的“自我”对异国虚构和想象的特点。因此对于那些跨文化的叙事作品,就有可能对不同文化读者产生影响,特

① [美]雷蒙·威廉斯:《文化分析》;刘象愚、罗钢主编的《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 9 月版,第 125 页。





别是那些描绘“异国形象”的作品返回“异国”的本土的时候,就会遭遇本土读者不同反响。两相观照,就会发现读者的阅读反应,不仅是不同文化的读者阅读兴趣和评价的不同,更是融铸了创作者的创作“变形”问题,是跨文化创作中所可能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的一个方面。赛珍珠、林语堂和汤亭亭的有关中国题材的作品,在国外/西方都成为热门畅销书,但是当它们返回中国的时候,就遭遇到了中国读者的“冷遇”。

学者赵毅衡说:“中国一个世纪翻译的西方文化文学著作,看来超过任何国家,几乎无书不译。但是有例外:西方人写中国的作品,哪怕影响巨大,如马尔罗的《人境》,赛珍珠的《大地》,一直无法使中国人感兴趣。即使译出,读者也看不出好处。批评家都怪‘细节失真’,中国人自己写中国的作品,细节皆那么真实?恐怕更主要的原因,恐怕是中国读者期待的西方性/普遍性,被中国题材固有的特殊性破坏了。”他还说:“近二十年来,海外华人的西文文学,蔚为景观,与林语堂的时代相比,已经进展巨大。这两种文学,有很大区别。但是两者有一个相同点:无论作者在哪里长大,无论使用何种语言,两类作者都是在西方写中国题材。由此也决定了这两种文学,都难以返回中国:林语堂用英文写的《瞬息京华》名满欧美,哪怕林语堂是汉语散文大家,这本大作依然让国人看不到好处。至于汤亭亭的《女勇士》,谭恩美的《喜福会》,在美国已经是现代经典,在中国始终受冷遇。除了交流道路的单向性,我无法解释这个问题。”^①

笔者以为,除了“交流道路的单向性外”,由于创作主体对叙事作品“文化”层面的不同关注,导致中国/本土读者对同一作品的不同评价,显示了异质文化读者和本土文化读者对同一文本的差异性评价,出现了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双单向道”的现象。然而这种现象的出现,不仅是创作者对于“异国”文化层面的不同关注,而且还包含了注释者在注释“他国”形象时,所包含社会大众对异国的集体想象,即社会大众已经形成的异国总体认识和看法在作家作品中的显现和作用。

^① 赵毅衡:《双单向道——对20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几点观察》,转引自 www.xys.org。赵毅衡把中西文化传递的不对称和不平衡性看作是文化交流的“双单向道”的表现。

